

中国通史

主编 赖新元

17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主 编 赖新元

副 编者 韩勇军

中国通史

⑯

第六卷

晚

清

编 者 于晓光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清 晚

道光二十九年，即 1849 年，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鸦片将烟路放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世界进入了中国。中国从此被卷入世界历史潮流中，开始了百年屈辱史。道光二十九年以前，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的，是自给自足的，是帮助的，故节的一人和一人要迈的历史，出了些自尊大的情绪，而是比任何历史都渺之甚。清末民初，发展完备了“天下一体”体解。

道光三十年之后，情况剧变。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先导，直接侵入，在中国割出英属香港、日属台湾和众多通商口岸，租借地。他们以此为跳点，不断深入内地。新的生产力创造出来的大臣商程，以基督教为特色的西方文化，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限制的保护下，涌人中国，掀起一阵阵的浪潮。由此开始，中国施行了特毒百年的噩运。中国来了一个和先前几千年不同的。

这一切的开端，起于鸦片战争。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开始	(1)
第一节 战前的中国与世界	(2)
第二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	(23)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和五口通商	(46)
第四节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	(73)
第二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沙俄侵华	(82)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82)
第二节 沙俄侵华	(119)
第三章 太平天国起义	(140)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140)
第二节 定都南京	(167)
第三节 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196)
第四节 太平天国的败亡与反清斗争 的余波	(207)
第四章 咸丰、同治时期的内政与外交	(243)
第一节 咸丰帝挽救危机的努力	(243)
第二节 垂帘听政制度的建立	(265)
第三节 清朝调整统治政策的措施	(297)
第四节 对外新格局的滥觞	(324)

第一章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即 1840 年，是清朝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若将视野放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由此，世界进入了中国，中国也进入了世界。

道光二十年以前，中华文明是单独发展的，一切外来之物只是辅助的，枝节的。这种令人豪迈的历史，引出了妄自尊大的情绪。正是从这种历史沉淀之中，清朝继承明朝，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道光二十年之后，情况剧变。西方列强以战舰为先导，直撞蓦入，在中国制造出英属香港、日属台湾和众多通商口岸、租借地。他们以此为据点，不断渗入内地。新的生产力创造出来的大量商品，以基督教为特色的西方文化，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权利的保护下，涌入中国，掀起一阵阵的浪潮。由此开始，中国进行了持续百年的激荡。中国变了，变得和先前几千年不同了。

这一切的开端，起于鸦片战争。

第一节 战前的中国与世界

1840年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个战争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划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这以后，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通常所说的中国的近代，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就是近代中国的起点。

17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王朝，比起汉、唐盛世并无逊色，但是它所处的世界形势却大大不同了。因为在清王朝建立的同时，欧洲已经揭开了近代史的新页。十八世纪后半期，当西欧已经开始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古国就明显地落后了。那时，刚好是清朝的乾隆中叶，这个王朝正循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旧有轨道，走向由盛而衰的下坡路。19世纪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带着血腥气蓬勃发展，而清朝经历了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更加腐朽衰败，江河日下了。

清王朝的危机表现为：第一，大地主、大贵族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破产现象十分惊人。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据1812年统计，直接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八十三万顷（每顷一百亩），其它大地主大官僚也占有大量土地。如乾隆年间的大学士和珅拥有“地亩八千余顷”，和珅的两个家人

刘全和马某也占有田亩六百余顷。江南一带，百分之一、二十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没有土地，以致“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

没有或缺少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佃耕地主的土地，地主通过地租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地租率一般为百分之五十左右，也有高达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此外，地主还向农民勒取贡献、劳役等各种附加租，如逢年过节要索取“送节钱”，嫁女要送“出村礼”，等等。农民还须向清政府交纳大量的赋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官僚一方面用增加地租的方法，把分担的田赋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另一方面还经常用隐匿田亩数目的手段，逃避田赋负担，因此，为数众多的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人，即“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欠。”在正额赋银外，农民还负担花样繁多的附加税，例如“杂办”、“火耗”等折损。每石正粮要加收“折耗”高达二斗五升之多，形成所谓“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的现象。农民不胜负担，生活十分困苦。

第二，和土地集中的过程同时，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残暴、寄生性与腐朽性也与日俱增。乾、嘉以来，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僚（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多次发生惊人的贪污案件，不过是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揭发出来的极小一部分丑闻而已。鸦片战争以前，奸相穆彰阿当国，“门生故吏偏于中外，……一时号曰穆党”。他的私党里面旗人最多，外放总督、巡抚、道员、知府等官，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旗

员知府，大多目不识丁，全靠幕僚和家丁替他们搜刮经办。所以那时的吏治更坏，贪风更盛。“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县太爷一下乡，不但农民奔避一空，连一般读书人也象逃避瘟疫一样：“县令将至某里，某一里之安分读书者，亦远避尽绝矣。然而〔县令〕又怒其不来迎送也，则搜及其室家，拘及其父母，皂块发床攫箧，无所不至。至于少女投池，寡妇自缢。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呜呼！至矣，极矣！贪酷之毒无以加矣！”这样的官府，不过是十足的盗匪和豺狼。所以当时的人概括清朝的政局是“鹰鹯徧野，豺狼噬人。”

第三，军队也腐朽不堪，清王朝的基本支柱是由八旗兵、绿营兵组成。八旗兵总数约二十二万人，绿营兵总额六十六万人。不论八旗和绿营，不仅兵器落后，而且营务废驰，百弊丛生，老弱滥充，训练不勤，约束不严，冒领口粮，正如当时任巡城御史的黄爵滋奏称：“凡此诸弊，悉为兵蠹，稍有缓急，其何可恃？”京城驻军“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用顶替，点缀了事。”外省军队，骑兵常常没有马，水勇则从来不习水，有些海防要塞，使用的还是三百年前的旧炮。至于沿海水师所用战船，大多是以“薄板旧

钉”制成，“遇击即破”。这样的军队，实际上已丧失了保卫国防，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了。

第四，政治的虚弱和文化专制是相为表里的；尤其清朝的满族贵族，为了维持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更不能不借助于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以禁锢人民的反抗意识。封建文化专制的手段很多，而主要是用孔、孟、程、朱之道进行奴役欺骗，用文字狱进行镇压摧残，用八股取士的制度进行利诱牢笼。为图使人们的思想严密控制在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模式之中。

政治愈加黑暗，军备废驰，财政拮据。土地兼并不已，税捐、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日益加重。阶级矛盾随之激化。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的斗争接踵而起。1774年王伦（手工业工人）领导清水教在山东临清起义。1781年甘肃回民起义。1787年林爽文、庄大田领导天地会在台湾起义。1796年更爆发了刘之协、聂杰人、徐天德、张汉潮等人为首的白莲教领导的湖北、四川、陕西农民大起义。他们以“兴汉灭满”为宗旨，用一人连十、十人连百、百人连千、千凑成万的办法，组织起广泛的革命群众（“白莲”隐含“百连”的意思）。这是张献忠、李自成以后又一次震动全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在西方，当时美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如火如荼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还在尾声。1796年的起义，先后投入的群众多至几百万人。起义农民转战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纵横驰骋，历时九年。清政府的常备军——八旗和绿营被打得望风而逃。最后依靠汉族地主组织地方武装“乡勇”，极尽野



蛮地屠杀血洗，才把这次农民大起义镇压下去。1813年白莲教支派天理会首领李文成（本匠出身）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其中由林清（药铺学徒）率领的天理会群众潜入北京，一度打进皇宫。北方白莲教发动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南方天地会和其他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继续进行。1817年和1832年广东、广西相继发生群众起义。1801年有贵州苗族的起义，1831年有湘西瑶族的起义。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各地群众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手工业工人、城市下层群众在斗争中日趋活跃。阶级斗争的猛烈和深度，表现出清朝的统治现在不但陷入了历史上多次重演的封建王朝衰落的危机，而且也碰到了中国古老封建社会临近灭亡的深刻危机。清王朝这个地主阶级政权在经过短暂的兴盛以后，已经同产生它的封建制度一起快要走到尽头，处在风雨飘摇中了。

正当清王朝国势衰微、日趋没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特别是英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半个多世纪以后，英、法、美等国的主要工业部门采用机器，大机器生产在纺织业中并占有主导地位。输出商品、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推动资产阶级不断去寻求、扩大新的原料产地，新的商品倾销市场。到19世纪3、40年代，非洲大陆的北部和南部，

美洲的加拿大，大洋洲，亚洲的西部、中部、东南部已经或者正在变为欧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日益增多地被卷进资本主义的漩涡里面。从国外的一面讲，鸦片战争是这个形势所引出的，往后一系列新的事变，也是以这个形势为背景一幕一幕地展开的。

英国、法国、美国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或宗主国，德国、俄国、日本后来也加入了同一个行列。印度、缅甸、越南和朝鲜等是与中国边境相连的国家。其中有殖民地，也有封建的独立国。

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先后侵占了中国的邻邦印度、新加坡、缅甸南部、阿富汗，于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政治腐败、技术落后的中国，便成为其主要的侵略对象了。

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并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鸦片战争前夕，法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为了开辟新的市场，也加紧向外扩张殖民势力。

美国在18世纪70年代取得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美洲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颇为迅速。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获利优厚，美国资产阶级也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货市场，和英国一样，总想排除进入中国的障碍，进一步发展对中国的掠夺性贸易。只是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单独来侵犯中国，所以当英国把侵略的锋芒指向中国的时候，



美国资产阶级就成了一个重要帮凶。总之，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通行，电报的使用，大量新的陆地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等，这种为过去任何一切世纪所不可企及，不可意料的生产力，使得整个世界的面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西方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世界并把中国卷入了世界经济流通的漩涡之中。

到 19 世纪 40 年代，由于工业革命的广泛开展，世界资本主义处在更大规模上升时期，欧美强国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征服殖民地的活动日益加紧。英国到处横行，充当着侵略国的急先锋。资本主义的侵略，俄国的疯狂扩张，已经或者正在将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邻近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它们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越来越少了。

中国在 1840 年以前还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中国社会保持原来的独立的行程，生产自给自足。古老的万里长城，顽强地抵挡着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那种重炮的轰击。在地主阶级看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不但是有害的东西，事实上也是完全陌生的东西。他们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闭关自守。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象潮水一样汹涌向东方推进，又必然使中国不断受到冲击。因此，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阶级、阶级斗争继续着旧的内容、旧的格局，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势。

清朝对外体制

17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在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巩固起国内统治的同时，又在明朝的对外体制基础上，发展完备了自己的对外体制。其核心有两点：“天朝上国”和“闭关锁国”。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性地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区划于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长久地自认为是“天下共主”。毫无疑问，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并不正确，但也客观地反映出中国文明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反映出外来文明在中国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并长久地维系了大一统王朝在中国的世系相传，反对分裂，即所谓“国无二君”。就这个意义上说来，这种错误观念尚有维护统一的进步意义。从世界历史来看，“天下共主”的观念也绝非中国所仅有，历史上许多封建大帝国的君主，也有此种观念。它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天下共主”的观念越来越显露出其破绽之处，但各朝统治者仅以些微变通而处之，并没有改变或放弃之。

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和外交的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有与世

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侵以后一些亚洲国家的封建政府也曾实行过类似的政策。这一部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逼出来的，一部分是封建社会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它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是立足于小农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自然经济下，连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何况广泛的对外贸易，自使封建统治者感到可有可无。田赋是封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工商业税收只占很次要的地位，对外贸易更加无足轻重。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话不全是封建帝王的夸诞之词，而是反映了闭关政策的经济基础。

第二，它是封建政府被迫自卫的一种简单手段。“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初到中国时，就充分暴露出它们的海盗习性，在东南沿海烧杀淫掠，强占土地，无恶不作。此外，在来华的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又往往为了争夺在华利益而发生剧烈的纠纷，甚至互相火并起来，侵犯中国主权，扰乱沿海的秩序。所有这些，都迫使清政府不能不进行防卫，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闭关政策。关于这一点，连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在欧洲人还未充分获得地位以前，他们已获得‘洋鬼子’这个难堪的称号。在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西方蛮夷的目的就是战争与抢劫。”“外国商人自己的残暴行为应视为他们被享以

闭门羹的主要原因。”

第三，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农业、手工业素称发达；而几千年来，周围的邻国一般都是相对的后进小国。中国和周围国家商业上、文化上的交流，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朝贡”或“贡舶贸易”的方式进行。久而久之，封建统治者养成一种虚骄心理，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别人是“夷狄蛮貊”；外国使者到中国来，无非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西方侵略者来撞击中国的大门，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仍然是那么回事，不加区别，“一体被中国人（应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编者）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睥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这种传统的陋见，对于统治中国的满族贵族来说，更有某种特殊微妙的政治需要，所以特别要坚持。

清朝在对外关系上，自认为“天朝”，不承认有平等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在某种意义上，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在机构设置上，清政府也未有外交机构。藩属国的朝贡、册封等事宜，由执掌王朝典仪的礼部来主管。而管理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其事务扩展至俄罗斯、廓尔喀，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这些国家似乎是藩部的扩大。乾隆末年、嘉庆末年的英使马戛尔尼（G. MaCartny）、阿美士德（W. P. Amherst）来华，清政府依其惯例，当作“贡使”来接待。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又派律劳卑（W. J. Napier）来华，两广

总督卢坤，未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于以“平行款式”递送信函。“中外之防，首重体制”，他立即以“封舱绝市”相对抗。道光十八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 (C. Elliot) 投递并无“稟”字样的文书（清朝并不承认其官方地位，仍按以往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来对待），两广总督邓廷桢立即退回，他认为“在臣一字之更，何关轻重，惟若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体制攸存，岂容迁就”。

就长远的意义来看，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列强，必然会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方式，迫使落后国家就其范围。而从近期来看，亟欲谋取海外发展的英国，因工业革命，对持续接受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外交制度、一口通商制度等等，开始不能接受。在此时，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不同于先前的鸦片走私贩子，竭力要求改变行商的垄断贸易、不明确的税额和正税以外多达数十种的陋规。而这些正是清政府“管束夷人”的手段和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渊薮。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因白银外流，对持续进行了一百多年的鸦片走私也不可再容忍了，其中最为敌视的是最为猖獗的英国鸦片贩子。每年数万箱的鸦片，使英国及英属印度政府，获取高达数以百万镑计的利益。

关于闭关政策的评价问题

第一种意见，基本肯定说。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认为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起了民族自卫作用”。刘大年指出：“首先，清政府实行禁海政策，虽然有‘要防范臣民与外人接触的意思’，但‘客观上

仍然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阻止外国侵略阴谋。”其次，“对外闭关并不就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原因。相反的，对于一个处在封建时代的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输入”，“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其他结局是没有的。”

第二种意见，完全否定说。戴逸、胡思庸等人指出：闭关政策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有与世隔绝的盲目排外的倾向，是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产物，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它防止封建经济解体，维护专制统治，导致中外贸易走上变态发展道路。它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关’是闭不住的，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三种意见，一分为二和分时期评价说。戴逸在《中国近代史稿》一书中指出：闭关政策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在“客观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成为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自卫手段。”

陈旭麓认为：“闭关政策虽然曾作为一种消极防御手段而起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也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严厉的禁烟运动

西方殖民国家向中国输入鸦片，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竭力发展对华